

博揚文化

陳孔立 著

臺灣學 導論

臺灣學重點研究當代，除了對有關各個學科領域的研究以外，還應當強調各個學科間互相滲透、密切聯繫的科際綜合研究。

建立臺灣學的重任理應由海峽兩岸的學者共同來承擔。

臺灣風雲09

臺灣學導論

作者 / 陳孔立

發行人 / 楊蓮福

主編 / 莊舒淳

文字編輯 / 游可韻

美術設計 / 黃國洲設計工作室

行銷企劃主任 / 江青衛

讀者服務 / 陳佩蘭

出版者 /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蘆洲市長安街269號3樓

電話：(02)28487732 傳真：(02)22812104

e-mail：boyong@tpts6.seed.net.tw

郵政劃撥帳號：18871684

戶名：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 林首愈律師

印刷廠 / 皇城廣告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80號14樓

電話：(02)82275988 傳真：(02)82275989

ISBN 957-0463-59-7

定價 350元

2004年12月初版一刷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臺灣學導論

陳孔立 著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代序

劉國深

陳孔立教授年逾古稀，論學識、論輩份、論貢獻，都稱得上大陸臺灣研究界的泰斗之一。接受他的囑託為此書作序，義不容辭，但心中卻有如千斤萬斤重擔在肩。為這本書作序，難！陳教授涉足臺灣研究領域時，我還沒出生；這又是一部敢為天下先的力作，我又如何才能為它寫序呢！

經過長時間的思想徘徊，我想還是以第一個讀者的身分談幾點感想，權且為序。

臺灣海峽的政治難題已經橫跨三個世紀，折磨了一代又一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國家社稷因之蒙難，天下蒼生因此受苦，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因而危如累卵。衡諸海內外研究臺灣問題者，或從歷史的角度，或從經濟的角度，或從文化的角度，或從政治權力鬥爭的角度入手進行研究。但臺灣問題太複雜，恐非任何單一學科可以全面解釋，歷史的因素、政治的因素、經濟的因素、文化的因素、臺灣內部的因素、兩岸關係的因素、國際關係的因素，多種因素纏繞在一起，可能沒有哪門學問如此高深。由此觀之，將臺灣研究發展成為一門科學，並不為過。

早在80年代後期，一位從事涉臺工作多年的前輩來廈門大學演講時就提出：應該創立「臺灣學」。雖然只是種概念性構想，但從當時的政治環境來說，可以說是一個驚世駭俗之議，引人矚目。儘管現在已有「巴蜀學」、「徽學」，甚至還有

「北京學」、「上海學」、「香港學」，但要把臺灣研究發展成「臺灣學」，沒有一點思想解放的勇氣是不行的。關於臺灣研究能否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問題，學術界可能還有不同意見，甚至還有人會從不同的角度作不必要的政治聯想。然而，筆者認為，學術研究不應該有什麼禁區，任何學術上的探索和創新精神，都應該得到熱烈的掌聲鼓勵。

誠然，「臺灣學」要真正成為一門成熟的科學，尚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正如陳教授所說：目前還無法總結出「臺灣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所以，寫作「臺灣學概論」的條件還不成熟，本書只是針對已有的研究情況，加以歸納、整理，總結一些經驗教訓，提出一些研究思路和某些可供參考的理論與方法，定位為「臺灣學」的入門書，提供初學者的參考，姑且稱之為「導論」。儘管如此，作者還是非常用心地介紹了現有的一些研究方法和途徑，甚至提出他自己總結出的「省籍－族群－本土化」研究模式，希望透過研究方法的創新，開拓思路和視野，以達到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

每個人的知識總是有限的，即使是研究臺灣這樣一個領域的問題，也不可能對每個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陳孔立教授的研究領域涉及臺灣歷史、政治及兩岸關係，對於臺灣的文化、經濟也有所涉獵。但他是謙虛和誠懇的，他主張臺灣學應該涉及經濟、文化等領域。他自認為對這些問題沒有深入研究，所以，這些內容他在導論中沒有詳加論述。我認為這是負責任的表現。無論如何，他已經開了一個好頭，餘下的處女地，應該由我們年輕一輩人去開墾和經營。



代 序

前 言 我與臺灣研究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建立臺灣學的依據.....	020
第二節 臺灣學的定義與性質.....	023
第三節 臺灣學研究的基本原則.....	029
第四節 研究者的角色.....	047
第五節 寫作本書的意圖與基本框架.....	056

第二章 臺灣研究的回顧

第一節 日本的臺灣研究.....	064
第二節 美國的臺灣研究.....	066
第三節 臺灣的臺灣研究.....	069
第四節 大陸的臺灣研究.....	073
第五節 對大陸「臺灣研究」的評議.....	079

第三章 臺灣歷史的研究方法與模式

第一節 臺灣歷史研究中的不同流派.....	098
第二節 臺灣史的分期和框架.....	110
第三節 「政治干預」在臺灣史研究中的表現.....	115
第四節 臺灣史研究的比較方法.....	122
第五節 臺灣史研究的其他方法與模式.....	131

第四章 臺灣歷史與現實的關係

第一節	臺灣歷史的基本特點.....	142
第二節	臺灣歷史與民眾心態.....	145
第三節	近半個世紀臺灣歷史與民眾心態.....	155
第四節	兩岸隔絕與民眾心態.....	169
第五節	民眾心態與臺灣學研究.....	180

第五章 臺灣政治的研究方法與模式

第一節	臺灣處在政黨政治的初級階段.....	186
第二節	研究方法的多樣性.....	197
第三節	歷史方法的運用.....	202
第四節	比較方法的運用.....	206
第五節	其他方法的運用.....	211

第六章 臺灣政治的研究模式

第一節	關於模式和研究途徑.....	226
第二節	模式的運用.....	230
第三節	「省籍－族群－本土化」模式.....	235

第七章 兩岸關係的研究方法與模式

第一節	關於兩岸關係的研究.....	252
第二節	研究方法的運用.....	277
第三節	模式的介紹.....	286

附錄：臺灣民眾的政治心態

壹、歷史的集體記憶與臺灣民眾的複雜心態.....	296
貳、1945年以來的歷史記憶與臺灣民眾的複雜心態.....	312
參、兩岸隔絕的歷史記憶與臺灣民眾的複雜心態.....	336

前言 我與臺灣研究

我從事臺灣研究是從1962年開始的。當時廈門大學歷史系主持舉辦「鄭成功研究學術討論會」，開會前夕，我的老師、歷史系主任傅衣凌先生要我參加會務工作，主要任務是整理討論意見，寫會議的學術報導。會後，我寫了《鄭成功研究學術討論會綜述》，發表在1962年3月16日的《文匯報》上，這就成為我寫的有關臺灣歷史的第一篇文章。後來，傅先生要我們繼續蒐集有關鄭成功和臺灣歷史的資料，他自己設法買到臺灣出版的「臺灣文獻叢刊」208種（叢刊一共有309種）。他還讓我參加由他主編的《鄭成功研究論文集》的編輯工作，我寫了《鄭成功收復臺灣戰爭的分析》一文。該書在「文革」前的1965年12月出版，印數非常少，這說明當時出版這類書已經是十分勉強的了。沒想到這一篇文章在「文革」中竟然成為造反派批判的物件。他們把研究鄭成功、研究臺灣歷史看成是「中宣部閻王殿」黑線佈置的任務，為首者陳在正副系主任被打成「黑線人物」，所有參加研究的人員都成為批判物件。他們說我寫鄭成功如何攻打臺灣，就是要國民黨按照我提供的路線打回來。我真佩服他們的「想像力」，可是當時是不能有任何辯解的，作為批鬥物件，「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要像「最高指示」一樣時刻不能忘記。所以，到了「文革」以後，我就發誓絕對不做臺灣研究了。

可是，從1974年開始領導又要我們研究臺灣史，在歷史系成立了「臺灣史研究室」，這回已經算是經過上級批准的

「革命任務」了。但是，沒有資料難為無米之炊。領導聯繫到福州軍區聯絡部，讓我們去福建前線廣播電臺查閱臺灣方面的資料。那時電臺大約有幾種臺灣報紙，已經是十分難得的了。由於條件的限制，我們又有教學任務，並沒有全力以赴，停停打打，沒有什麼成績可言。我只是在業餘寫了一本通俗性的《臺灣歷史故事（反侵略篇）》，算是最早的成果。到了1979年中央決定成立專業的臺灣研究機構，選中了廈門大學，據說就是因為廈大已經有十幾位教師研究過臺灣史，還有一位教師開始研究臺灣經濟，這在當時全國各地來說，已經是實力最強的了。

1980年臺灣研究所成立時，我還在學報編輯部工作。1981年當時的所長陳碧笙教授招收研究生時，要我參加，我因主持學報工作繁重不敢接受。不過在這個時期，我並沒有放棄臺灣史的研究，多次由陳在正副所長帶領我和青年教師鄧孔昭，前往第一歷史檔案館、近代史所等地查閱、複印臺灣歷史檔案和資料。我們拿著微薄的出差補貼，住在最便宜的招待所裡，自備碗筷到故宮職工食堂裡吃飯，天天按時「上班」，而壁而坐，不停地翻閱資料，晚上唯一的娛樂是擠在過道裡看足球賽的電視轉播，在北京一住就是一兩個月，這種情況現代的青年教師可能會當作是「天方夜譚」。

1982年由傅衣凌先生主持召開「鄭成功研究學術討論會」，邀請美國、日本、荷蘭及全國各地100多名學者與會。傅先生要我參加會議論文的審查工作，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好幾位教授的論文沒有入選（當年的教授是十分希罕的），因為他們寫得過於一般，實在無法和臺灣以及海外已經發表的論

文相比，如果把這些論文作為會議論文，不僅有損於廈門大學的聲譽，對作者本人也沒有好處。在那次會議上，廈大教師提供了好幾篇有份量的論文，出版了《鄭成功研究論文選》續集、《鄭成功研究論叢》、《臺灣鄭成功研究論文選》等書，海內外學者公認廈門大學是鄭成功研究的一個「重鎮」。

直到1984年陳在正教授擔任所長的時候，動員我調到所裡來，並且得到學校黨委的同意，從此，我才正式成為臺灣研究隊伍中的一員。

臺灣歷史的研究

起初主要從事檔案校點工作，陳在正、鄧孔昭和我三個人，把從檔案館複印來的檔案進行斷句、標點，其中多數是「軍機處錄副」，寫的都是草書，經常需要借助草書字典才能讀懂。在這個工作的基礎上，我們出版了《康熙統一臺灣檔案史料選輯》《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並且與第一歷史檔案館合作出版了《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輯》，還有一些檔案已經做了標校工作，還沒有出版。後來，鄭成功研究還繼續進行，1987年由本所主持召開了「鄭成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並且出版了論文集。

與此同時，我開始進行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的研究。那幾年有機會坐冷板凳，沒日沒夜地工作。1984～1987年是我成果最多的年份，1990年出版了《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一書。有三篇論文提交在芝加哥、臺北、香港舉行的學術會議。《清代臺灣分類械鬥的若干問題》是1986年在芝加哥舉辦的「臺灣問題國際研討會」論文，當時我查閱了幾乎所有有關械

鬥的資料，並且做了臺灣械鬥史實辨誤工作，在這個基礎上，對械鬥進行全面的考察，而不是做個案研究，從分類械鬥的含義、歷史條件、具體原因的綜合分析、歷史過程的綜合考察、分類械鬥與移民社會都展開討論。我的體會是對所研究的課題，必須盡可能詳細地佔有資料，同時對自己的論點要做到「言之有據」，這樣，面對他人的提問或質疑，就會心中有數、充滿自信了。《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的特點》是1988年1月在臺北舉辦「第一次臺灣史學術討論會」論文，當時兩岸還沒有開始交流，我雖應邀前往臺灣，可是到了香港，臺灣方面不允許入境，論文只好由他人代為宣讀。臺灣的《民眾日報》發表消息：「陳孔立文到人不到，臺海學術首開交流」。這篇論文是利用大陸新發現的重要史料《問俗錄》寫成專文，參與臺灣學者的爭論，直接與他們對話。儘管觀點不同，可以激發大家的思考，因而引起他們的興趣。我總覺得我們從事臺灣研究、寫有關臺灣的學術論文，一定要設法和臺灣學者對話。如果論文只是「各說各話」，互相沒有交鋒，交流的作用和意義就要大打折扣。《清代臺灣社會發展的模式問題》提交1988年7月在香港大學舉辦的「臺灣經濟、歷史、文學、文化國際研討會」，這是在上文的基礎上寫成的，對臺灣學者之間的爭論發表評論，並且展開深層的討論，提出自己關於發展模式的主張。論文還討論了研究方法問題，認為歷史學與社會學、人類學結合，採用比較方法、系統方法和宏觀研究，對於類似的大課題的研究是有助益的。

1987年我開始擔任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所長，為了適應與臺灣學者對話交流的需要，我不得不「改行」以當代臺灣為

研究重點，不過臺灣歷史的研究也沒有中斷。90年代初還參與了臺灣學者有關「臺灣史觀」以及「臺灣歷史的分期和框架」的討論，發表有關中國傳統文化與臺灣文化的關係的幾篇論文。

1994年由中國史學會和全國臺灣研究會發起編寫《臺灣歷史綱要》，由中國史學會會長戴逸教授擔任編委會主任委員，著名史學家金沖及、王慶成、李學勤、李侃等參加編委會，由我擔任主編。編寫任務主要由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歷史研究室的成員承擔，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近代所研究所和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些學者參與了部分工作。這項工作歷時兩年，編委會多次召開會議，對編寫工作給予具體的指導。該書出版以後，受到史學界的重視，專家們認為此書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具有專史的深度與功力；把臺灣史放在整個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下加以把握，既強調了祖國歷史發展的共同因素，也突出了臺灣地方史的特色；有助於瞭解臺灣問題的由來和癥結所在，瞭解臺灣今後發展的趨向等等。戴逸教授強調：「歷史學家要尊重事實，實事求是，秉筆直書，不粉飾，不隱諱，不曲筆，公正客觀地還歷史以本來面目，並努力從過去的史實中探索規律，接受教益。」¹我們在編寫中就以這個精神作為指導。我個人通過編寫此書得到的主要體會是：「臺灣歷史作為中國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它與全國的歷史有著共同性；但臺灣作為中國的一個比較特殊的地區，它的歷史也必然有其特殊性。如果只強調共同性，而忽略其特殊性，就不能正確地認識臺灣的歷史，也不能正確地認識臺灣的現實；如果只強調其特殊性，而忽略了共同性，就不能正確地認識歷

史上的兩岸關係與當前的兩岸關係，也無法正確地認識和對待臺灣的前途問題。」²

後來，出版社要我寫一本可供一般讀者閱讀的《簡明臺灣史》，我就在《臺灣歷史綱要》原有的框架下，加以通俗化。刪去全部古文，一律用現代語文，對全書各章節都做了全面的修改，有的部分作了較大的刪節，有的地方加以補充，力求做到線索更加明晰、內容更加集中、重點更加突出、可讀性更強一些。我雖想在歷史著作的普及方面做一些工作，但是看來這件工作頗有難度，還需要史學界的共同努力。

90年代後期，我想提到三篇文章。一是1996年應賴澤涵教授的邀請參與他所主持的研討會而寫的〈清代臺灣社會動亂原因與性質的分析〉，當年我因為已經受邀參加在臺灣舉辦的另一場研討會，所以只是提交論文，沒有到會。這篇論文並不長，卻花了不少時間。我把清代臺灣所有的起義、遊民騷亂、地方豪強騷亂、其他動亂事件、民間械鬥、土漢衝突，一一蒐集、核查、剔除、補充，然後進行分類，提出總體的看法。至今我還記得1995年在新加坡炎熱的日子裡，埋頭在電腦上修改稿件的情形。二是〈臺灣歷史的「失憶」〉，這是專門針對有些人有意歪曲臺灣歷史而寫的，最初發表在臺灣出版的《海峽評論》雜誌上。這是一篇比較長的文章，針對有關臺灣歷史的特色、臺灣歷史的開端、明鄭政權的性質、移民與祖籍地的關係、臺灣開港後與大陸的關係、臺灣是荒蕪之地還是先進省份、誰應當對《馬關條約》負責、所謂自由選擇國籍、地方自治選舉、生活水平急速提高、怎樣看待日據時期的建設等問題，用具體的歷史事實反駁了曲解歷史的論調。³三是〈移民

和移民社會的理論問題），我在寫作臺灣移民社會歷史時，十分希望找到有關移民和移民社會的理論，可惜所能找到的多是有關個別問題的理論，沒有發現系統的全面的論述。為此，我想應當盡可能地在這方面做一些有益的工作，為後人繼續進行移民社會的研究提供參考。這項工作已經積累了相當時間，後來看到葛劍雄主編的專著《中國移民史》，其相關觀點頗有啟發，可以開展討論，因而寫成了論文，提出了個人的看法，相信對於進一步的討論是有幫助的。這篇論文已經收入2003年出版的《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增訂本中。

臺灣政治與兩岸關係研究

我從事當代臺灣問題的研究，一方面是由於形勢所迫，一方面則是自願的。所謂形勢所迫指的是擔任所長以後，正好兩岸開始往來，來訪的臺灣學者、記者以及外國的學者、記者、外交官很多，他們所談的大多是當代兩岸關係問題，同時我還經常接受海內外媒體的採訪，談的也是現實問題。如果我只懂得臺灣歷史，就無法與他們對話，那將是極大的憾事。1987年9月臺灣《自立晚報》記者李永得、徐璐衝破當局的禁令，前來大陸，採訪了本所，發表了這樣的報導：「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蒐集資料真不少，臺灣歷史瞭如指掌，現況認識不足」。面對這樣的形勢，迫使我不得不「改行」。說是自願的，因為1953～1955年，我曾經在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學習理論，對當代問題很感興趣，研究臺灣現實問題正好給我一個機會。於是，我當機立斷，把研究的重點轉移到現實方面來。

我認為作為一所大學的臺灣研究所，它與其他研究機構相比，應當有所側重。從事學術研究可能是我們之所長，而充當智囊、幕僚，進行對策研究則是我們之所短。我給自己「定位」，側重於當代臺灣的學術研究。學術研究需要實事求是，需要公正客觀，需要獨到見解，需要講真話。同時，我認為要研究臺灣政治，不能就政治談政治，需要關注深層的文化，需要瞭解臺灣民眾的心態，從這些方面深入地瞭解臺灣，是研究臺灣政治和兩岸關係的必備條件。有一次我對研究生演講，有人問我：你為什麼記得什麼人在什麼時候講過什麼話？我回答說，這是我的日常工作之一。我十分關注臺灣同胞的心態，凡是和臺灣人士接觸，都要把能夠反映他們的心態的話記錄下來。因為我們不能經常前往臺灣，不是生活在臺灣的環境中，不可能有臺灣同胞一樣的心態，也不可能真正瞭解臺灣。我最擔心「以己度人」，把我們自己的想法硬套在臺灣同胞身上，那樣就無法得到正確的認識，研究的結論是會遠離臺灣的真實。

我研究臺灣政治，是從研究民進黨開始的。1988年開始寫作《民進黨：過去、現在、未來》，1989年完成。這本書寫的「不是時候」，那時有些出版社出了問題，正在清查，其他出版社猶如驚弓之鳥，對於敏感的選題一概不敢出版。當初一再催稿的編輯，最後只好表示道歉。後來時過境遷，我就不再續寫了。我發表的第一篇有關臺灣政治的論文也是有關民進黨的：《民進黨與1989年選舉：預測與解釋》。當時有一位研究臺灣的德國學者來訪，他從臺灣各個縣市來分析選舉形勢，給我很大啟發。因為當時大陸學者一般多是從宏觀角度進行選舉

的預測，哪個黨有什麼優勢，有什麼劣勢，然後就推論誰贏誰輸。我把參選縣市長的14名民進黨人分別進行分析，認為有把握當選的有3個縣，有50%可能的有5個縣市，不可能當選的有6個縣市，總的估計民進黨可能取得5~7席縣市長。選舉結果民進黨有6人當選，其中彰化縣我預測不能當選結果當選了。⁴這是本所對臺灣選舉進行預測的第一次嘗試。

在兩岸關係方面，我曾經嘗試用決策論（博弈論）來研究兩岸相處的原則，認為現在兩岸關係的性質是對抗性和非對抗性並存，一方吃掉另一方的競賽規則已經不適用，應當採取「非零和競賽」的規則，因此博弈論的若干原理對處理兩岸關係有參考價值。⁵

這個時期我發表的論文不多，卻經常接受媒體的採訪，隨時發表對臺灣政局和兩岸關係的看法。特別是1992年訪問臺灣以後，接受的採訪更為頻繁。每逢臺灣或兩岸之間發表重要事件或兩岸領導人發表重要談話時，媒體記者當天就要電話採訪，而我作為臺灣研究所的負責人是無法推託的，只好本著實事求是和坦誠相待的態度發表自己的看法。同時，我也相當重視臺灣媒體的採訪，我把它當作與臺灣各界人士對話的一種機會。我不僅要向他們說明我們的立場和主張，還要向他們說明我們的誠意和善意，希望通過這樣的對話，能夠消除對方的疑慮，降低彼此的敵意，增進雙方的瞭解，增進相互的共識。1991年10月民進黨通過「臺獨黨綱」時，我表示這是走向臺獨的嚴重一步，希望民進黨主席許信良能夠整合黨內派系，「勿使民進黨真正走上臺獨的道路」，也希望民進黨內有識之士能夠發揮好的作用。1992年我們訪問臺灣時，有人擔心大陸

的態度變得「強硬」，我告訴記者：要正確解讀大陸的立場，就應該注意政策的連續性，反對臺獨是我們一貫的立場，大陸只是重申這個立場，並沒有什麼改變。1993年「汪辜會談」後，臺灣記者問我對會談「政治意義」的看法，我說：「有政治意義但不要泛政治化」，會談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一步，是一個開始，不是兩岸關係的重大突破，並沒有觸及政治問題。要到兩岸真正坐下來談政治問題時，兩岸關係才算有重大突破。1994年臺灣選舉剛剛結束，我正好訪問臺灣，《中國時報》資深記者楊憲村進行了專訪，我們坦誠地談論有關臺灣政黨政治、反對黨的發展、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以及「千島湖事件」與兩岸建立互信等問題。1995年在李登輝訪美之前，我就指出：兩岸對「一個中國」的解釋不同是最大的分歧，兩岸領導人見面的時機尚未成熟，李登輝訪美，大陸必然反彈。1996年3月臺灣選舉結束後，媒體馬上採訪，他們問我：為什麼廈大臺灣研究所對選舉的得票率預測如此精確？我回答說是「碰巧的」。這是實話，因為事實證明我們不可能每次都能預測得正確無誤。同時，我也明確表示：臺灣的大選不是「統獨對決」，這種意見與當時多數人的看法並不一致。同年6月，香港《南華早報》傳出消息：江澤民將親自訪問臺灣，在臺灣引起震動。記者採訪時，我立即明確表示：在臺灣當局未回到「一個中國原則」之前，江澤民訪臺絕不可能，這是一種沒有根據、不瞭解大陸事務的推測。1999年1月我參加「海協專家組」訪問新加坡，當時臺灣方面有意貶低汪老將要訪問臺灣的意義，說它只是一種「單純回訪」，我在接受臺灣記者採訪時表示：汪老那麼大年紀，如果去臺灣只是陪辜先生看看京戲，就